

#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7 讲， 回归真理，女传教士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 7 节，回归真理，女传教士。

我们今天的讲道名为回归真理，讲述了瓦尔多派女性及其在信仰中扮演的角色。

当然，在瓦尔多开始传教之初，十二世纪就有男女传教。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理解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的圣经依据？即使在早期教会，瓦尔多派也研究了几段经文，我现在要读其中两段给你们听。马可福音第 16 章说，安息日一过，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和撒罗米就带着香料去膏抹耶稣。

七日的第一天清早，太阳刚升起，她们就来到坟墓那里。她们彼此问谁能为我们把墓门上的石头滚开？她们抬头一看，发现那块很大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她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身穿白袍的年轻人坐在右边，她们很惊慌。

耶稣却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的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看，有一个地方安放了他。

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先你们去加利利。你们在那里会见到他，正如他告诉你们的一样。于是她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了，因为她们被恐惧和惊讶所笼罩。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把所吩咐的一切，都简短地告诉了彼得周围的人。后来，耶稣亲自通过他们从东到西，发出了神圣而永恒的救赎宣告。

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复活，就先显给抹大拉的马利亚看。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她出去告诉那些一直与耶稣在一起的人，当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但他们听说耶稣活了过来，并且被她看见，就不相信。

因此，那段经文的重点是耶稣向玛利亚宣告，让她去告诉兄弟们。当然，在那段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劝告他的追随者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他们。但接下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3 章 23 至 29 节。

在信心来临之前，我们被监禁和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到信心被显露。因此，律法是我们的管教者，直到基督来临，以便我们能因信称义。但现在信心已经来临，我们不再受管教者的管教。

因为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 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因此，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如果你们属于基督，那么你们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是主的话。虽然瓦尔多派妇女公开传教超过 50 年，但到了 13 世纪下半叶，由于罗马教会反对瓦尔多派妇女的暴力迫害，她们开始承担一些对外界来说不那么显眼的角色，但这些角色对于她们信仰的实践来说，与信徒团体一样至关重要。

sorores [拉丁语中的姐妹]的团体中，我们认识到了姐妹会这个词，瓦尔多派女性门徒的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sorores，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瓦尔多派姐妹会，开始将她们的事工重点重新放在在瓦尔多派社区内建立临终关怀网络上。这些临终关怀院由妇女经营和管理，旨在向穷人、病人和贫困妇女提供款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这样的救济院中，修女会开始为巡回的瓦尔多派牧师 (barba) 提供住宿，并开始了瓦尔多派神学院和学校的前身。修女会的头衔传达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男性则肩负着更明显的传播福音的使命。修女会组织所体现的这种伙伴关系对于瓦尔多派信仰社区的见证是必不可少的，只要瓦尔多派传教士和福音派在整个欧洲派遣两人一组的牧师的制度仍然存在，这种伙伴关系就一直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到来，它给新教基督教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瓦尔多派对传教的重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巡回传教转变为担任固定地点的信仰社区和礼拜堂的牧师。此外，在加入改革运动后，瓦尔多派传教士不再在瓦尔多派神学院接受培训，而是去瑞士日内瓦的学校和神学院学习。因此，修女的传教以及对瓦尔多派巡回传教士的支持和培训（barba）的重要性逐渐减弱。

然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瓦尔多派当前对儿童和公民教育的重视、森林中心（瓦尔多派接待所）的建立以及对穷人和社会边缘群体的服务方面，姐妹会的影响仍旧存在。瓦尔多派事工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姐妹会事工的重点。用现代术语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称之为执事事工。

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后，我们现在回顾 20 世纪 40 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新的动态变化开始影响瓦尔多派教会。首先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变化，从主要担任家庭主妇转变为进入工作和专业领域，而传统上被定义为男性的工作。

影响瓦尔多派教会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有意担任牧师的男性人数大幅减少。到 1948 年，这些问题成为每年 8 月举行的瓦尔多派宗教会议讨论的主题。因此，瓦尔多派教会的行政委员会 Tavola Valdes（类似于长老会的大会）首次被要求研究女性担任牧师的问题。

这项研究的早期文件揭示了从事这项研究的男性的偏见。他们的重点不是男女在事工中的平等，而是探索女性为某些类型的牧师职能带来的特殊天赋。罗马瓦尔登斯神学院的 Giovanni Miegge 教授被任命领导由三名男性组成的研究小组，他们被指示解决这三个特定问题：辅助事工、女性事工以及女性在瓦尔登斯教会管理机构中的参与。

在这场辩论的最初十一年中，教会大会和著作的焦点往往是强调女性事工，而不是女性在事工中的作用。这种区别似乎有点模糊，但这种强调往往会强化一种偏见，即将某些次要的事工职能，如监督主日学校、青年活动、妇女团体、

探访事工和一些行政工作归为女性教会工作人员。另一方面，男性是被任命的神职人员，他们负责传福音、执行圣礼并参与教会的重大决策。

当然，这种分工只有在瓦尔多派最大的教会中才有可能。这场争论的焦点武断地排除了在大多数瓦尔多派教会中服务的女性，因为这些教会太小，无法支持第二名专业工作人员。到 1954 年，瓦尔多派大会采用并确立了教会助理的角色，即女性可以与男性神职人员合作，进行探访事工、宗教教育和妇女事工。

由于文化偏见影响了女性在事工中的作用，讨论的焦点不断从女性在神职中的作用转移到更易于管理的女性在教会中的作用，正如刚才所述，通过强调辅助女性助手在较大的瓦尔登斯教会中的作用。请记住，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这些观点在美国主流基督教中被广泛持有。这种强调使所有讨论都从女性在神职中的作用转移到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十年来，这个问题每年 8 月在意大利 Torre Pellicci 举行的宗教会议上由一群男性神职人员和长老讨论。

经常有人提出关于女性的陈规定型论点，反对她们作为牧师的天赋，但这些论点没有得到反驳，因为只有男性在场发言，即使有极少数女性在场观察辩论。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一次宗教会议上，有 8 名女性出席。她们前来聆听，但在男性教会领袖坚持要求她们参与辩论后，其中两名女性犹豫不决、胆怯地发言。

出乎意料的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在讨论的问题上，女性的观点没有组织严密、表述清晰。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成熟的立场，表达出普遍认同的女性观点。早在 1949 年，米格教授就写道，他认识到《加拉太书》第 328 章及其引述，在基督里不再有男性或女性，是平等的基本原则，它清楚地表达了福音的精神。

米格在 1949 年的报告中总结道，教会有充分的权利（如果不是义务的话）来调整我们对女性事工的理解，并推进加拉太书 328 章中的绝对平等原则。米格正确地认为保罗的这封信是保罗神学的核心。在加拉太书中，保罗传达了所有人在受洗时都会收到的洗礼公式。这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新创造的形象，一个团结改变社会分歧的新创造。

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说，在基督里，没有男人或女人、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如果你信仰基督，那么你就扎根于基督，并作为上帝的儿女、圣约的继承人属于基督。在基督的新创造中，性别角色不再适用。

在基督的社区中，信仰是识别因素。如果我们信奉基督，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与圣约之子的身份相同。经过十年的研究，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米格教授一直在从各种角度探索女性任命这一棘手的问题，包括从圣经、神学、历史的角度，以及根据欧洲一些教会的经验，这些教会中有女性担任各种领导角色。

米格最终敦促教会尝试实验，并根据经验发现女性在事工中的意义。因此，1959 年，瓦尔登斯教会的管理机构塔博拉委托卡门·特罗比亚女士 Ceteroni 本人是一名辅助教会工作人员，曾在罗马神学院接受教育，整个夏季都全权负责教堂事务。对于会众和 Trobia 女士来说，这一积极的经历成为将辩论转向考虑女性担任神职人员的基线。

1960 年 8 月，瓦尔多派妇女联合会在大会召开前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几天后，大会召开时，大会听取了妇女们的首份官方意见，有效地提倡妇女在神职中的作用。但随着这次发言，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关于瓦尔多派教会是否仍然需要神职牧师角色的严肃辩论。

这两个问题的结合引发了一场关于牧师所需素质的严肃讨论。从 1960 年到 1962 年，讨论从教会大会扩展到意大利各地瓦尔多派地方教会的意见。1962 年教会大会召开时，地方教会的辩论中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都得到了塔沃拉会议的解决。

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是基于人们担心女性在照管灵魂方面会比男性拥有更大的权威。塔沃拉已经研究这些问题 13 年了，它解决了这一问题，指出牧师的权威来自圣经的权威和履行牧师的职责，而不是来自一个人的性别或个性。反对意见被驳回。

教会内部提出的第二个担忧是，由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原因，女性很难承担牧师的重任。塔沃拉反驳说，被召唤从事牧师工作的男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选择。第三个担忧是女性在担任牧师角色时男性化，对此的反驳是，人们认识到教会不应将其事工集中在牧师手中，而应该更有效地让教会成员参与体现所有信徒的祭司职责。

最后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经济性质的。考虑到男女将竞争被任命的领导职位，塔沃拉的回应特别有趣。不要相信向女性开放牧师职位会导致牧师人数膨胀。

他们在 1962 年写道：“我们坚信，女性牧师永远是少数。”在宗教会议上讨论了所有这些担忧后，瓦尔多派教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允许女性受戒的决议。1967 年 8 月，首批两位受过神学院培训的女性瓦尔多派牧师被受戒，其中包括卡门·特罗比亚女士，并开始在教会服务。

在将我所读文献中没有阐明的历史脉络联系起来时，我开始疑惑，为什么米格教授没有指出女性在瓦尔多派运动最初几十年中的作用是女性被任命为牧师的理由。然而，我了解到，直到 1962 年才对古代教会进行了首次研究。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教会领导层才知道女性在 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开始传教。

1961 年，瓦尔多派社区很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引以为豪的这一传统。瓦尔多派女性的专题研究至今仍是一项鲜为人知的学术研究。回顾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想到两件事。

首先，第一代瓦尔多派信徒在遵守和实践《圣经》方面受到了多么激进的引导，以至于他们敢于公开挑战罗马天主教会，尽管他们已经为自己解释了《圣经》。其次，我很惊讶圣经学者和教会领袖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赶上第一代瓦尔多派男女信徒的信仰见证。八百年后，我们对福音信息采取了同样进步和基于信仰的态度，就像我们的信仰祖先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那样。

在这方面，上帝的真理已经回到原点。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这是关于女传教士的布道的延续，也是中世纪教会女传教士的回应，题为《被蔑视所掩盖》。

早在十二世纪，瓦勒度派女性就从圣经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女先知安娜和其他早期女性信徒（如普里西拉和多加）的见证中找到了传福音的理由。早在 1180 年，妇女就在公共场所宣扬福音。她们很可能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传教了，但在 1180 年，天主教主教伯纳德·克莱尔沃的秘书欧塞尔的杰弗里撰写了一份报告，谴责两名瓦勒度派女性在法国克莱蒙市传教，并公开侮辱主教伯纳德。

这两个女人被斥责为异端，后来又被贴上妓女的标签。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瓦尔多派男女信徒传教时，他们的信息直截了当。他们经常背诵翻译成当地语言的经文，公开劝诫人们谴责罪恶，忏悔错误。

根据罗马教会自 12 世纪起撰写的大量正式报告，即使是这种基本级别的宣告也被罗马教会视为严重而致命的威胁。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这些报告的数量大幅增加。欧塞尔的杰弗里讽刺了瓦尔登派社区中的女传教士，将她们与《启示录》中的假先知妓女耶洗别相提并论。

这与《列王记》中的耶洗别一样，她嫁给了亚哈王，反对先知以利亚，成为巴力神的狂热追随者。杰弗里禁止妇女在教堂讲话或教导，引用了《提摩太后书》第 3 章第 6 节，称她们是可怜的小妇人，背负着罪恶，好奇多话，直言不讳，厚颜无耻，擅闯他人家中。他认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女性的完美典范，她把一切都默默地藏在心里。

丰考德的伯纳德将玛利亚描述为女性的完美典范。从 1180 年代到 1190 年代初，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来反对瓦尔多派女传教士，并引用教会法律，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平信徒传教，因为这是对牧师职责的不服从。他说，这些违法者应该被视为反基督者，应该被公开排斥。

瓦尔多派引用了许多经文来肯定妇女传教的权利，例如《路加福音》第 2 章第 36-38 节中，耶稣受割礼时，先知安娜被瓦尔多派引用来支持女性传教。伯纳德在反驳中写道，安娜在圣殿里说预言，而不是传教，不知何故他把这两者区分开来。13 世纪对瓦尔多派的迫害愈演愈烈。

13 世纪的旅行主要由商人、吟游诗人、推销员和女性完成，而她们不应该在路上行走。到 13 世纪中叶，对女传教士的迫害非常普遍，以至于迫害迫使瓦尔

多派女性以不那么公开但同样充满活力的方式表达她们的信仰。整个瓦尔多派社区都认识到，他们的男性在公共场合传教要容易得多，而不会立即引起怀疑，因为他们可以从事理发师、医生、小贩、工匠等行业来掩盖他们传播福音的主要目的。

作为对瓦尔多派妇女的暴力迫害的直接结果，她们开始承担一些对外界来说不太明显但对她们作为门徒团体的见证同样重要的角色。我们之前提到过姐妹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这样的收容所中，姐妹会还为巡回牧师的准备提供了住宿，并开始了瓦尔多派神学院和学校的前身。

这种伙伴关系对于瓦尔多派信仰团体的见证不可或缺，而且在瓦尔多派派出牧师的 1530 年代之前，这种伙伴关系一直至关重要。因此，这补充了我刚才讲的讲道，我认为补充这一点可能很好，因为它提供了更多有关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道。这是第 7 节，回归真理，女性传教士。